

[Special Contribution]

Literary Creation,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An Interview with Mr. Cao Shanke

¹Wang Zuyou ²Cao Shanke

¹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²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24, 2023

Accepted: December 6, 2023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CAO Shanke. (2024). Literary Creation,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An Interview with Mr. Cao Shank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001–01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1>

Abstract: Among the foreign language scholars I have known, Professor Cao Shanke is a unique man. Apart from teaching, he is also a writer who has bo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romantic ideal pursuit.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life is the source of literary creation. As a literary critic, he believes that there exist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on and criticism, which is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promoting. Academic critic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literary creation. He criticizes the excessive playful attitude to scholarship because it leads to a pat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ew of language and a “flattening” of the view of values and interpretation. He places great expect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believes that the “newness”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be the “new”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is based on some necessary knowledge. The basis of essential knowledge is that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ross-pollinating” with knowledg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at can spark new ideas. If this method is used in research, it will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so that the research itself expands the vision of raising questions, thinking about problems and solving problems, and then innovation is possible.

Keywords: Cao Shank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value; “cross-pollinating”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Zuyou, male, Han nationality, Ph. D.,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pecializ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CAO Shanke, male, Ph. D.,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specialize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文、論同做,情、理兼顧

——曹山柯先生訪談錄

¹王祖友 ²曹山柯

¹泰州學院

²杭州師範大學

摘要:在我所認識的外語界學者當中,曹山柯教授是很獨特的。他除了教書育人,還是一位既有文化歷史意識,又有浪漫理想追求的作家。他堅信生活是文學創作之源。作為文學評論家,他認為創作和評論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共生關係;學術評論對於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他批評學術過度娛樂化,因為那會導致語言觀的病態轉型以及價值觀、闡釋觀的「躺平」。他對新文科建設寄予厚望,認為新文科的「新」應該是創新的「新」,而創新是建立在一定的必需知識基礎上的。這個必需知識基礎就是文科教育要與能夠激發出新思想的其他學科知識進行「交叉融合」。如果用這種方法去做研究,就突破了傳統做法,使研究本身拓展了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的視域,讓創新成為可能。

關鍵詞:曹山柯;共生關係;價值觀;「交叉融合」

王祖友(以下簡稱「王」):曹教授,您好!很高興受編輯部委托,對您進行書面採訪。您的身份雖然是一位大學教授,但給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位既有文化歷史意識,又有浪漫理想追求的作家,能談談您的文學創作嗎?

曹山柯(以下簡稱「曹」):王教授稱我為作家,實在不敢當。我只是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嘗試著搞點文學創作,想要給我年少時的文學創作夢想做一點補償。

我年少時的文學創作沖動主要來源於我的生活體驗和父母影響。父親還是北京大學學生的時候就被打成了右派,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七師一三一團支邊。當時,新疆環境很差,生活很苦。記得剛到新疆時,由於暫時沒地方住,我們一家被安排住在羊圈裏。那時我很小,大概兩歲半的樣子,可綿羊們盯著我的神色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後來,我們搬進了地窩子裏居住。所謂地窩子就是在平地挖出一個約兩米深、面積十幾平方米的長方形坑,坑頂上放幾根樹樁,再鋪上紅柳條或葦把子,再鋪上麥草或雜草,最後用泥巴蓋頂。當然,地窩子會留出一個供自由進出的通道。雖然地窩子非常簡陋,但在那個年代卻非常實用:冬暖夏涼。我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土臺子書桌的地窩子教室完成的。如果在我的世界真的存在「浪漫」的話,那麼我的浪漫生活從童年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是我人生當中最寶貴的生活體驗和文學創作源泉,值得一遍遍地回味。

我讀小學二年級時,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經開始在全國燃燒。自然,我父母作為「五類分子」經常

被押到外地揪鬥；而我們幾個子女還小，家裏沒有吃的，有時只得去垃圾堆撿拾人家丟棄的白菜葉子果腹。雖然當時我也感到很恥辱，但為了活著，必須要那麼做；這也不失是一種別趣的創傷「浪漫」吧。慶幸的是，造反派抄了我們的家，卻忘記了把我家那本傷痕累累的《聊齋誌異》拿走。所以，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才有機會在白雪皚皚的冬天，躺在破舊的被子裏，靜靜地聽父親講《聊齋誌異》裏的鬼故事。這時，外頭刮著狂風，下著大雪，地窩子火爐裏的梭梭柴發出劈裏啪啦的燃燒聲響。雖然，懵懵懂懂，但在這種別有風味的浪漫中，我的文學情感開始得到培育。如果離開了這種豐富的生活源泉，無論什麼樣的善惡判斷、精神世界和審美意識等都是無從談起的。生活是文學創作之源。

其實，我在奎屯市讀高中時就開始嘗試文學創作了。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學校的教學斷斷續續，化學課取消了，數學、物理、語文也經常停課；學工學農是常態，最受學生歡迎。當時，我有了想法：總不能高中一畢業就直接去修地球吧，應該去一三一團團部當個幹事什麼的，日子才好過。可是，那個時候，想當幹事比登天還難；再說，自己出生在五類分子家庭，不可能有那個機會，除非具備他人缺少的特殊才能。

恰好，高中同學陳開俊和我一樣，都有一個想要通過文學創作找到一條出路的想法，於是我們倆為了這個共同目標走到了一起；後來還與奎屯市幾個愛好寫作的高中生形成了一個文學創作圈子。當時，上海知青陸天明寫了一部大型話劇《揚帆萬裏》，展現了上海知青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勞動、生活情況，在全國引起強烈轟動；陸天明於一九七五年年底調進中央廣播文工團電視劇團編導組。無疑，陸天明的成功例子給我和陳開俊是個極大的鼓舞。我們冬天在屋子裏，夏天在樹蔭下不知疲倦地討論如何把文學創作搞好。我們當時多次討論過王願堅的短篇小說《七根火柴》的寫作技巧。我們廢寢忘食地寫小說，寫完後，經常在周選家裏聚集，相互交流。周選的父親是奎屯人民醫院院長，住宅很寬敞。她姐姐長得漂亮，經常給我們倒茶水，有時還參與討論。那段激情而溫暖的文學創作的初始經歷令我終生難忘。記得我當時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名字叫《山城諜影》，不過，小說還沒寫完我就考上大學了。

讀大學的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把日軍侵華時期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以及發生在中國 20 世紀 60-70 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史詩形式記錄下來。尤其是在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管是國家中央級別的高級幹部還是底層的普通百姓，都受盡了苦難；這樣的浩劫人類歷史一萬年都難得遇上一次，肯定是長篇史詩取之不盡的源泉。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在高校教書。繼續深造、申請各種課題、撰寫論文、評職稱以及撫養孩子等事情接踵而來，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實現那個以史詩形式書寫文化大革命的夢想。

在中山大學讀博士期間，區鈺教授倡導他的博士「塗鴉」，隨便寫點什麼，以加深對文藝理論的理解。那時候，我時常寫點詩歌之類的作品。張廣奎是我的師弟，也是我的詩友；他的詩我很喜歡，我們私下對詩歌創作討論得比較多。那個時候，我發表了一首五百多行的長詩《情殤——獻給人類的兒女們》，記得長詩中有這麼幾句：「這邊的水吞沒了遼闊的土地，/那邊的土地被火烤得裂開痕。/發生了顛倒的是那四個季節，/病弱不堪的是天邊的臭氧層。」

我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是從調到了杭州師範大學之後開始的。2015 年 5 月，我去南京旅遊。當我步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站在「萬人坑遺址」前面，望著裏頭的屍骨沉思時，忽然感覺到有個聲音從天空傳來：「死不瞑目！死不瞑目！」我突然驚醒，心裏浮現出一個念頭：以史詩的宏大敘事形式來寫南京大屠殺。日本侵華的那段悲痛歷史不能忘記，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更不能忘記。我給那部展現南京大屠殺的史詩取名為

《魔鬼的盛宴》，2019年由臺灣凌零出版社出版；整部史詩 12600 余行，24 萬余字。國內著名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呂周聚教授，以論文《超視角的歷史反思與正義審判——敘事長詩〈魔鬼的盛宴〉解讀》，對《魔鬼的盛宴》進行了評論，發表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 年第 4 期(p. 133-137)。

接著，我創作了展現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長篇英雄史詩《金色播種機》，全詩 12600 余行，約 25 萬余字；2021 年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它從紅軍領導農民抗租抗息寫起，直到紅軍勝利抵達陝北。「突破三道封鎖線」、「血戰湘江」、「搶渡烏江」、「攻克婁山關」、「遵義戰役」、「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以及「穿越大草原」等，都是詩歌中的重要內容。

再接著，我創作了一直都夢想著要創作的展現上世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史詩《知向誰邊？》，全詩 12500 余行，23 萬余字。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活力，人民的生活品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也變得越來越大，使不少混得很差或不得誌的人產生了仇富心理；而這種負面情緒甚至演變為對文化大革命深深懷念的病態情結。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屢屢犯下難以饒恕的錯誤，其破壞性足以堪比任何毒蛇猛獸；而文化大革命就是一頭猛獸，完全徹底地摧毀了中國人的人性。《知向誰邊？》的宗旨是要時刻警示世人：別要一不小心就跌進了文化大革命似的痛苦深淵。《知向誰邊？》以兩個不同造反派派別的頭目陸國慶和許愛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動軌跡為主線，力圖為讀者再現那場荒唐而殘酷的革命運動的真實面貌。《知向誰邊？》雖然創作完成了，但還在等待出版時機，就像裏頭的一節詩所說的那樣：「時間，唯有時間具有永恆的塑造力！/它改變著空間，塑造著人和新世界；/陳舊和腐朽，到頭來被丟進墳墓裏。/惡的臭的醜的，唯有時間能夠清理，/哪個暴君不死亡，哪個暴政不衰敗？/請問，什麼刀具比時間之劍更鋒利？」

提起那三部史詩的創作，我一定要提起殷企平教授，並且還要感謝他。有一年，我去西藏旅遊，回到杭州後，創作了一首 600 多行的長詩《西藏，最後的淨土》。那天，殷企平教授請我和從韓國來杭師大講學的金英敏(Kim Yeong Min)教授一起吃飯；席間，談起詩歌和詩歌創作的話題。我無意中提到我剛剛創作完成的長詩《西藏，最後的淨土》以及寫詩的感想。隨後，殷企平教授叫我把那首長詩發到他手機上，他想要讀一下。第二天，殷教授給我發來短信說：寫得精彩，太震撼了！殷企平教授對我的鼓勵使我想到了創作那三部史詩的基本方法：既然六百多行押韻的長詩《西藏，最後的淨土》可以讀下去，我完全可以把每部史詩分成 30 章，而每章的情節也可以當作 500 行左右的押韻長詩來寫；這樣寫出來的史詩每章都有豐富的故事情節，是應該可以令讀者讀下去的。所以，國內著名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呂周聚教授在評論《魔鬼的盛宴》的文章《超視角的歷史反思與正義審判——敘事長詩〈魔鬼的盛宴〉解讀》中說，「《魔鬼的盛宴》為長篇敘事詩的寫作提供了一種模式。」^①

王：您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有著深沉的愛，2016 年您申報獲批的國家社科項目就是關於雪萊研究的課題，雪萊對您有什麼非同尋常的意義？

曹：雪萊是我最敬佩和熱愛的英國偉大詩人之一。他是一個極具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的詩人，一生充滿了革命的戰鬥熱情，對人類的前途滿懷信心和希望，在詩歌裏以崇高的理想構建自由、平等、幸福的社會，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譽為「真正的革命家」和「天才的預言家。」

國內對雪萊詩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抒情詩上,而我對他詩歌的閱讀和研究,除了他的抒情詩外,更多地集中在他的長詩、詩劇、散文和小說等作品上,從政治與神話的視角來透視雪萊及其詩歌中想要傳達出來的偉大精神和理想世界。《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阿多尼》以及《麥布女王》等詩歌裏都涉及到了神話及神話的適應性,即神話在雪萊詩歌中是如何適應政治主題的。雪萊詩歌博大精深,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現實關懷,較強的政治性、革命性、叛逆性、戰鬥性和較高的藝術性。他詩歌的思想內容非常豐富,自由、平等、寬容、憲政、博愛、公有製以及女性主義等構成他詩歌的主要政治主題,並在很多情況下以神話的藝術表現形式凸顯出其意義的深度和廣度,具有深厚的審美價值。

雪萊詩歌中的神話運用技巧對我的史詩創作影響很大。在那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史詩《魔鬼的盛宴》裏,我就採用了神話敘事技巧,把戰爭的邪惡描寫置於荒謬、可笑、嘲諷的情景中,試圖使故事情節更具感染力。例如,下面《魔鬼的盛宴》裏的兩節詩:

言罷,一個黑影手握尖刀撲向野田,
像一團量子從野田的身體穿過,
無影無蹤,在場的人誰也看不見。
野田頓時倒地,痙攣著呻吟:
「冷啊!冷啊!真冷啊,該死的夜晚!
是誰在我的心裏放置了冰塊?啊,死神就在眼前!」

這時,向井已嚇得面如土色,毛骨悚然,
他朝四周望了望,想要拔腿就跑,
可是,無論怎麼用力,兩腿不聽使喚。
他想要大叫,但有個東西鎖住了喉嚨,
叫也叫不出聲,動彈也不能動彈,
像地獄受罰的魔鬼,拖著無形的沉重鎖鏈。^②

詩節裏的那個黑影是野田殘忍殺害的守軍俘虜。雖然被砍頭而死,但他的靈魂依然要與魔鬼般的野田進行頑強搏鬥,嚇得野田的同伴,那個「拖著無形的沉重鎖鏈」的向井,面如土色、毛骨悚然。

王:您創作的《金色播種機》借助史詩的宏大敘事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現了當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在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下波瀾壯闊的英雄壯舉。《金色播種機》似一支壯美、高亢的天籟,彰顯出一個堅持真理的正義之士的嚮往和情懷。您的這類創作是不是為了弘揚主旋律?

曹:我創作《金色播種機》時並沒有想過「為了弘揚主旋律」而創作的問題。創作是一種發自靈魂深處的沖動,就像一股泉水,非要從泉眼裏沖出來不可。2017年,我去甘南旅遊。諾爾蓋草原在20世紀30年代是一片遼闊無際的死亡之地,行走在上面的紅軍官兵隨時都會陷入松軟的草地,被黑乎乎的泥水吞噬。漫步

在諾爾蓋草原,想象著紅軍過草地時的艱難情景,我的淚水都流出來了。我似乎看見了中國工農紅軍踉踉蹌蹌地從那裏走過,也想起了我在大學時要以史詩的宏大敘事形式展現紅軍長征的夢想;於是決定返回杭州後,立即著手創作展現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長篇英雄史詩《金色播種機》。

「史詩」一詞源於古希臘語,意思是「說話」或者「故事」,這大多是關於英雄的故事,或者民族中最重要、祖祖輩輩都不可忘記的歷史事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當然是中華民族中最重要、祖祖輩輩都不可忘記的歷史事件。雖然我在創作這部史詩時並不是「為了弘揚主旋律」這個目的而創作的,但這部史詩從客觀上卻體現了任何「牢記使命,不忘初心」,堅持真理的正義之士的嚮往和情懷。殷企平教授在《金色播種機》的《序》裏寫道:「最終,中國工農紅軍奇跡般地絕處逢生,取得了勝利,到底是憑著什麼精神創造了如此奇跡?是『安泰情結』!中國工農紅軍就是戰無不勝的『安泰』,而哺育紅軍樹立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就是滋養他們的大地母親。」

正因為紅軍具有對真理和正義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紅軍官兵才能夠在與敵人拼殺中表現出沖鋒陷陣、無所畏懼、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

「沖啊!」獨臂戰神的驚天怒吼發自胸腔,
即刻,幾個粵軍接連被快刀砍中倒地,
馬蹄發出嚓嚓的響聲,踏在了屍體上。
一個粵軍嚇得連滾帶爬,渾身灑滿血和腦漿,
「饒命啊!饒命啊!」恐懼的尖叫響徹雲霄,
馬刀深深砍進頭骨裏,恰好在耳朵上方。

「媽呀!到底是人還是鬼,還是天兵神將!」
見馬刀上下飛舞,敵人嚇得兩腿直哆嗦:
「竟然僅憑一條手臂,他就能把眾兵掃蕩!」
在獨臂戰神眼裏,馬刀就是敵軍的愁殃,
一刀劈過去,敵兵倒地,全身劇烈地抽搐,
見此情景,其他敵兵精神崩潰,痛苦難當。^③

這是第三歌第一章裏對紅軍第四師師長洪超(1909-1934)馳騁戰場的描寫。獨臂英雄的形象呼之欲出,而對洪超這樣的真實歷史人物的描寫在《金色播種機》裏比比皆是;他們都是滿懷革命理想和信念的英雄。習近平主席說:「沒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沒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撐,要取得長征勝利是不可想象的。」^④正因為如此,紅軍連續粉碎了粵軍、湘軍、桂軍、黔軍、川軍、西北騎兵和國民黨三四十萬部隊的圍追堵截,沖出重重包圍圈,充分彰顯了中國工農紅軍無堅不摧的英雄氣概。這種英雄氣概在我國當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王:我認識到您是一位具有崇高文化品質和歷史責任感的作家,您能談談當代作家的社會功能或者歷

史使命嗎？

曹：王教授，您提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話題。文學創作的主體是人，是作家或詩人。只要是個正常人都會對事物進行是非、善惡的判斷和對善的追求，何況作家和詩人呢？我認為，當代作家對是非、善惡符合邏輯、情理的判斷和對終極善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就是他的社會功能和歷史使命。文學作品中的憂傷、歡喜、悲憤等情感總是與作家或詩人所描寫的人物的善惡形象和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作為當代作家，他應該使自己的精神生產活動與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去更有效地促進社會文明的發展。

只有當作家或詩人在精神生產活動中創作出來的作品具有廣泛的審美價值時，其作品才能夠被文明社會認可，才具有歷史使命的價值，才能夠起到積極的社會功能作用。否則，不能稱為有價值的作品。以題目為《一把好乳》的中國當代新詩為例：

她一上車/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聳/屁股隆起/真是讓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膨脹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終於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將身邊的小女兒/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擋住我的視線/嗨，我說女人/你別以為這樣/我就會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著/這回盯住的/是她女兒/那張悄悄的小臉/嗨，我說女人/別看你的女兒/現在一臉天真無邪/長大之後/肯定也是/一把好乳房//

在歐美詩歌創作與批評的影響下，很多中國當代詩人和詩歌批評家在評論中國當代詩歌時，往往認為：當代新詩的中心意旨就是要逃避現實、消解崇高、消解意義，把詩歌當作「下半身」的「意淫」的工具。試問，這樣的當代作家或詩人的文學作品怎麼可能起到正常的社會功能作用，這樣的當代作家或詩人又怎麼可能承擔得起厚重的歷史使命呢？

王：您同時也是一位文學評論家，對創作和評論的關係比別人更深有體悟吧？能說道說道嗎？

曹：正常的創作和評論之間的關係倒是很像根瘤菌與豆科植物共生的關係：豆科植物為根瘤菌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碳源和能源以及其它必需營養；而根瘤菌則為豆科植物提供氮素營養。所以，創作和評論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係。評論需要文學文本來（寄生）進行評論，而作家和詩人也需要從評論家的評論那裏汲取所需的營養，使自己創作出質量更好、更受讀者歡迎的文學作品。

我創作那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史詩《魔鬼的盛宴》之前，就讀了不少文學評論文章和文學評論專著；例如，我讀到過黑格爾的觀點：「一般地說，戰爭情況中的沖突提供了最適宜的史詩情景，因為在戰爭中整個民族都被動員起來，在集體情況中經歷著一種新鮮的激情和活動。」對這類關於史詩的評論的閱讀讓我產生了以史詩的恢宏敘事方式創作《魔鬼的盛宴》的念頭。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文學評論受到某種利益的誤導而劍走偏鋒時，文學必定會受到災難性的打擊。還記得《平安經》事件吧。吉林省公安廳原黨委副書記賀電「創作」了一部長詩《平安經》，在國內一家很有些知名度的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平安經》完全是流水賬似的拼湊和機械性的造句累積，全世界挨著地名報

「平安」,既沒有文學性,也沒有教育性,很難稱作「文學作品」。試舉一節如下:

中華港口平安

上海港平安,深圳港平安,寧波舟山港平安,廣州港平安,
青島港平安,天津港平安,廈門港平安,大連港平安,營口港平安,
連雲港平安,香港港平安,高雄港平安,澳門港平安。

《平安經》一出版就召開了公益朗誦活動和學術研討會,還有不少學者為這部作品背書,還有學者兼「評論家」的詩人為這部作品寫讀後感。當地多家官媒還為這部作品發表新聞通稿,廣播電視臺等還進行了同步展播。顯然,這種創作與評論之間的關係是病態的,是要摧毀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歷史使命的。

王:您還記得第一次發表作品的心情嗎?

曹:記得,而且還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是我本科畢業後的第一年,即1983年。那年,我弟弟讀高中,問了我一個 have 加名詞後面跟動詞過去分詞如何理解的問題。我受到啟發,寫了一篇小論文《Have+複合賓語的用法》,把 have 加名詞後面跟動詞原型、動詞現在分詞和過去分詞的用法都總結了一番,發表在當時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英語學習》上。那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對我鼓勵很大。當時,我很高興,也很激動,於是揣著那篇小論文掙來的15元稿費請朋友去飯館裏美餐了一頓。

王:文學是人學,中外文學都離不開對人的謳歌或批判,您曾經到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師從劍橋大學著名詩人蒲齡恩(J. H. Prynne),他對文學,特別是詩歌有什麼獨到見解?您認同嗎?

曹:的確,就像您說的,文學是人學,因為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不是孤立、抽象的,而是從事社會實踐的人;所以,人既是文學活動的出發點,也是文學活動的歸宿點。我很贊同馬克思關於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學說,在經濟基礎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我是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成長的人,與在英國文化語境下成長的英國劍橋大學著名詩人蒲齡恩(J. H. Prynne)在情感和認識方面存在著很大差異。

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學時,蒲齡恩(J. H. Prynne)是我的導師;他規定我每個星期五下午4-6點在他辦公室和他聊天,討論包括學術在內的任何問題。蒲齡恩是著名的英國實驗派詩人,任教於劍橋大學。他的詩歌創作與英國的詩歌復興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繫,在他的詩歌裏瀰漫著對英國傳統詩歌保守寫作方式的反叛氣息。我曾經就蒲齡恩和他的詩歌創作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英國實驗派詩人 J. H. 蒲齡恩的詩學觀》,發表在《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蒲齡恩的詩非常隱晦、難懂。我在劍橋大學訪學時曾問過專門講授詩歌的洛根(Logan)博士是否讀得懂蒲齡恩的詩,他搖搖頭說:「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蒲齡恩的詩歌確實很難懂,但為什麼難懂呢?談到他的詩歌創作時,蒲齡恩給我說起兩件頗有趣的事情:一件是關於他在澳大利亞租住的房子裏寫詩的故事。一天,他在寫一首詩,想找一個詞來表達一個新穎

的意思,但是半天也想不出來。他就在心裏想,「我走出這個房間,如果看到一個字,就把這個字寫到我的詩歌裏。」於是他就走出房間,接著走出院子。結果在走出院子不遠的地方看見一塊牌子,上面寫著 Locksmith,於是他就把那個詞寫在了那首詩裏。另一件也是關於他寫詩的故事。一天,他在劍橋大學街道上隨意散步,突然發現路旁有一個破爛的紙箱子。他頓時產生了奇怪的念頭,走過去看一看箱子裏頭究竟寫著什麼字,結果發現裏面有 mini-cheddars(一種餅乾的商標)的字樣,於是後來他就把這個字用在了 For the Monogram 那組詩裏。他的這些怪癖、神秘、無規律性的超越常規的品質讓我清晰地感覺到了他身上所流露出來的某種詩學理念:詩歌應當創造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新穎來,即便這種「新穎」可能會暫時造成讀者的閱讀難度也在所不惜。我曾多次問過蒲齡恩先生如何去評判一首詩歌的優劣,他的回答是:好詩一定是隱晦、難懂的,不可能讓你一下子就讀明白,而要讓你花時間去反復琢磨才有滋味,才有意義。

蒲齡恩先生詩友圈子裏的詩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曾邀請我去倫敦參加一個詩人聚會,在那裏見到了一些年輕詩人,發現他們寫的詩歌也很不好懂。於是,我問其中一個詩人:如果詩歌的語言太晦澀,連普通讀者都讀不懂,那怎麼可以像傳統詩歌那樣在廣大讀者中間流傳呢?他很以為然地回答:詩歌語言必須變得晦澀難解,否則就不是詩歌了。詩歌沒有必要讓所有人讀懂,只要有人能夠讀懂就可以了,即使僅僅是圈子內的人。他的這個觀點顯然是受到了解構主義思想的影響。例如:德裏達就曾試圖打破語言文字的規則,以形成「意義」;他不僅不關注文藝作品意義的存在,而且還想方設法地去破壞意義的存在,使它變得虛無。如出一轍,蒲齡恩先生就是通過在詩歌創作上打亂語言的固定規則來創造意義的。

我個人非常不認可蒲齡恩(J. H. Prynne)先生的詩學觀,因為我一直堅定不移地認為:包括詩歌在內的任何文學作品應該是讓普通人讀的。如果讀者讀不懂,那樣的文學作品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包括詩歌在內的任何文學作品都必須要滿足讀者閱讀、理解、愉悅的需要,能夠在他們的心靈深處引起共鳴或反思;否則,文學創作將變得毫無意義,將走向死亡。我也非常坦率地把我的文學觀告訴了蒲齡恩先生。

王:作為評論家,您認為學術評論的最重要意義是什麼?

曹:學術評論的作用和意義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是它的引導作用。儘管有的學者不喜歡「意識形態」這個詞,但「意識形態」確實存在於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學是人民的文學,這個觀點沒有錯。如果文學作品不去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就不會被廣大讀者接受,就會被拒絕,就會走向死亡。哲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等著作都是同樣的道理。這就關係到意識形態的問題。然而,意識形態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變化的;好的、積極的、善的意識形態對社會進步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樣,社會的進步也會使意識形態發生嬗變;而學術評論則一直在潛移默化地推動著意識形態的嬗變。例如:上世紀的五四運動就是一場促使意識形態嬗變的文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學術評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胡適等文化先驅對新詩的評論和倡導使我國傳統的古詩詞創作形式最終被新詩取代。這不僅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更是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學術評論的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硬幣的正面和反面總是不同的;學術評論既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也可以起到負面作用。例如,T. S. 艾略特有一段這樣的話:「我們只能說,我們現在的詩人可能必須難懂才行。我們當前異常多樣化,異常複雜的文明在敏感的詩人那裏,必然產生多種多樣的、複雜的結果。因此,詩人們必須更具有包容

性,運用更多典故、措辭,更加間接,以此來迫使語言形成意義——如果有必要,還可以打亂語言的固定規則來創造意義」。^⑤毋庸置疑,艾略特的這段話既是一種學術評論,也是他運用在詩歌創作中的手法;但,這種受到不少國內外評論家推崇和引用的觀點並非無懈可擊。的確,艾略特在他的《荒原》裏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詩歌創作手法,裏頭有不少典故,在語言表達上也打亂了固定規則;雖然艱深隱晦,但讀者還是讀得懂。可是,當他的這種寫作手法引進中國後,被中國當代詩人運用時,卻起到了啼笑皆非的負面效果。例如,某年的《中國新詩年鑒》裏收錄了這麼一首詩,題目為《檢查》:「人不得不拉屎/所以/我在拉屎時/弄臟了一張紙//。」這完全是癡人說夢話,是狂人「意識流」的隨意流淌,卻遠遠不如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那麼表達得清楚。《中國新詩年鑒》收錄的應該是當年發表過的優秀新詩。如果諸位有時間,請翻閱一下 2000 年以來的《中國新詩年鑒》,裏頭有很大一部分新詩都是這種大同小異的表達方式。

毋庸置疑,那首題目為《檢查》的詩歌不是那麼健康。此類新詩的創作和出版使中國當代新詩不斷走向邊緣化。究其原因,都是詩人們在有意無意識當中接受了西方類似於 T. S. 艾略特那種學術評論或創作思想,並追求、模仿歐美詩歌的創作所造成的。中國不少當代詩人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以歐美為代表的第一世界的學術評論和創作思想連同詩歌文本的翻譯一起進入中國,像綿綿細雨一樣對中國的本土詩歌評論和創作進行著「潤物細無聲」的滲透。由此可見,學術評論有著多麼重要的引導作用。

王:您怎麼看目前學界存在的一些學術娛樂化現象?

曹:您提出一個非常好、非常有趣的問題。當下,圈子裏流傳著「玩文字」、「玩文學」和「玩學術」的說法。「玩」就是要使文學和學術娛樂化,而學術過度娛樂化的結果就是語言觀的轉型以及價值觀、闡釋觀的「躺平」,那是件非常悲哀和可怕的事情。

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迷失·偏食·失語——對中國 20 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文學的反思」,裏頭涉及學術娛樂化問題。在那篇文章裏,我認為:學術娛樂化使語言觀轉型,使後現代語言觀的特征在文學中表現為:不談世界、對象、真理、歷史、社會、人物、情節而只談語言、符號、本文、語境、關係、結構、生成、轉換、消解。這樣一來,它拋棄任何升華、淨化之類的爛漫色彩而向日常生活靠攏;其結果必然導致價值觀和闡釋觀的「躺平」。所以,當今不少的作家和詩人崇尚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批評思想,即懷疑歷史、懷疑真理、懷疑進步、懷疑終極價值,結果只剩下當下的肉體感官快樂。

在學術娛樂化的影響下,我國文學界的不少作品也呈現出萎靡、墮落的娛樂化傾向;我在上面提到的當代新詩《檢查》和《一把好乳》就是詩歌娛樂化的典型表現。在這種學術評論和文學創作的語境下,《平安經》得到順利出版和炒作也就不足以為奇了。

王:您作為外國文學研究專家,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學術經歷可以分享嗎?

曹: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學者很多,我算不了什麼。但,有一點我覺得值得一提,那就是,外國文學研究者除了要紮紮實實掌握一些國內外的文藝理論之外,一定還要多讀、精讀國內外經典文學作品。如果條件允許,研究者自己可以嘗試著搞點文學創作,這對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的理解或許會有很

大的幫助。

王：您曾經做過外國語學院的院長，有哪些是您特別難忘的經驗或者遺憾？您對外語專業的新文科建設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曹：我做外國語學院院長時，特別難忘的經驗沒有，倒是有不少的遺憾。最大的遺憾是，由於經費短缺，學院沒有能力把更多的年輕教師送出去學習、進修。

「新文科建設」是在當前高校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按我的理解，新文科的「新」應該是創新的「新」，而創新是建立在一定的必需知識基礎上的，這個必需知識基礎就是文科教育要與能夠激發出新思想的其它學科知識進行「交叉融合」。例如，外國文學研究不僅可以與中國文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甚至還可以與醫學、生態學、量子力學等相關科學知識「交叉融合」。當我們分析、討論雪萊的《西鳳頌》時，不僅完全可以運用心理學、生態學、生命倫理學的基本知識，而且還可以運用量子糾纏的基本知識和理論來解讀這首詩。如果這麼去做研究，我們就突破了僅僅用熟悉的傳統文學理論來分析、解讀這首詩的傳統做法，使研究本身拓展了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的視域，讓創新成為可能。

参考文献

- ① 呂周聚：《超視角的歷史反思與正義審判——敘事長詩〈魔鬼的盛宴〉解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頁133-137。
- ② 曹山柯著：《魔鬼的盛宴》，臺北：凌零出版社，2019年版，第四歌第三章第64、65節。
- ③ 曹山柯著：《金色播種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頁83。
- ④ 習近平著：《習近平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頁49。
- ⑤ Eliot, T. S. (1951). "The Metaphysical Poet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 Faber.

(Editors: JIANG Qing & KCJ)